

#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道德维度 视域下的发展观演进研究

余达淮, 许飞剑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0)

**摘要:** 能否发展不仅关乎民生和国运, 且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彰显。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的重要秘诀之一便是坚持以科学真理性与价值合理自觉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在发展观上自觉地做到了将发展的科学维度与道德维度辩证统一, 突出地表现在成功解决了“如何发展”和“为谁发展”的辩证关系问题。其中, “为谁发展”这一道德标尺不仅发挥着价值规范的作用, 更发挥着价值引航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观经历了以平均分配为核心的发展观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五大发展理念”的演进过程, 道德维度上分别呈现出以民生为本的人道情怀、以人为本的道德价值彰显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道德价值理念的特质。“为谁发展”这一始终不变的人民的立场构成了其中的一条主要线索与鲜明特色, 而不同历史时期对该问题的不同理论回答及实践落实则构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且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 道德维度; 发展观; 演进

**中图分类号:** D6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20)02-0026-07

## The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Concept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70 Years Ag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Dimension

YU Dahuai, XU Feijian

(School of Marxism, Hehai University, Nanjing, Nanjing, Jiangsu 211100,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is not on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fate of the country,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founding of PRC 70 years ago, one of the important secrets of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our socialist cause is that we adhere to being guided by Marxism, which consciously unifies scientific truth and rational value. The scientific dimension of development and the moral dimension are dialectically unified, and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ow to develop” and “for whom to develop” has been successfully solved. Among them, the moral yardstick “for whom to develop” not only plays the role of values norms, but also plays the role of values guidanc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has gone through the evolution process from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with average distribution as the core to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nd then to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In the moral dimension, it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收稿日期: 2019-10-18

作者简介: 余达淮(1962-), 男, 安徽歙县人,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伦理。

许飞剑(1981-), 男, 江苏扬州人, 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of humanity based on people's livelihood, the display of people-oriented moral values and the people-centered shared moral values. The unchanging position of the people, "for whom", constitutes one of the main clues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the different theoretical answers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this ques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constitute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its ultimate purpose is to promot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moral dimension; development view; evolution

“如何发展”“为谁发展”是发展中两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重要问题,不仅关乎民生问题的妥善顺利解决,关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更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能否得到应有的彰显。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的重要秘诀之一便是成功解决了“如何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实现了两者的自觉统一。其中,发展的科学维度的演进脉络学界有了较为深入的探究,但发展的道德维度的演进轨迹及其规律性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实际上,发展的道德维度不仅为“如何发展”发挥着价值规范的作用,更发挥着价值引航的作用,使发展的科学性得以保障。立足于道德维度视域,通过回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要演进阶段中的发展观,不仅有助于厘清道德视域下发展观的演进轨迹,更有助于为未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道德指引,夯实道德基础,从而在维护与保障人民利益的基础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一、以“均贫富”为价值取向的发展观:民生为本的人道情怀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分配领域实行的是一种以平均分配为主的分配模式——习惯上称之为平均主义。尽管此种平均分配模式遭受了众多诟病,但是,这一分配方式其实是那个时代落后的经济条件的历史必然,它自身也构成了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观道德维度的重要内容和特征,并为当时民生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体现了该模式内含着深厚的传统道德文化意蕴、以民生为本的道德情怀,在特殊年代具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

《共产党宣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均贫富”的理论依据。“在那个艰难的时代里,不可能全面引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更无法系统研究和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因此,作为党纲且流行最广的《共产党宣言》就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的核心要义是通过建立公有制实现社会财富的共享,所以,集体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尊重劳动是《共产党宣言》的核心价值观。<sup>[1](p56-60)</sup>“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sup>[2](p39)</sup>“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sup>[2](p45)</sup>以此为指导,在我国发展实践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分配方式上,必然是以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实现即财富均等化为价值旨归,于是,“使收入水平形成纵向的等级性(城市工人的八级工资制)和横向的均等性”。<sup>[3](p5)</sup>并且,一定范围内的平均分配与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配给制比较吻合,因而,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关于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理解与认知,视平均分配为一种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分配正义。

分配方式最终取决于可分配的财富,社会主义中国建立之初生产力水平极度落后是当时实行平均分配的物质基础。受多年战乱影响,当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加之西方采取的封锁与制裁措施,导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有限的消费资料必须采取大致均等化的分配方式。“从1958年至1978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20年中非但没有获得长足的进步,反而因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国家整体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的情形,由此导致人民的物质条件未能得到改善,生活水平亦未得到提高。”<sup>[4](p237)</sup>“某些农村地区在整个1962年中粮食供应持续地处于饥饿水平表明了农村生活水准所受的异常压力。迟至1962年春季,在甘肃西北部的敦煌、玉门、酒泉和金塔等县,70%居民的粮食消费量每天不足1/4公斤,甘肃张掖半数农村居民的粮食消费量甚至更低,每天只有3盎司。”<sup>[5](p343)</sup>在此

物质条件下,按劳分配因缺乏现实的经济基础而无从谈起,进行平均分配式的物质资料供给便成为当时不得不实施的分配方式。虽然平均分配并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公平正义要求与价值取向,但在物质生活资料严重匮乏且人的基本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形下,实行平均分配是维护大多数人生存权益的人道选择,其中蕴含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均贫富”式的平均分配并不完全等于平均主义分配,前者还是承认结果上的适当差异的。

当然,“均贫富”式的平均分配的实行除了受制于当时的物质条件这一客观的基础外,也有着传统道德文化的基因,广大人民群众虽然身体进入了社会主义,但思想深处仍然存留着浓厚的封建时代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观念的影响,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几千年小农生产方式所养成的公正观,在这种公正观看来,收入上的差异化是要被革除的等级制度与不公平的表现。而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新型公正观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那种生产力条件下是难以被确立和接受的。

总之,在生产力严重落后,全社会的劳动成果极其有限甚至是严重匮乏的背景下,实行平均分配对于维系民众的生存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当时全社会还没有建构起民生保障机制的情况下,它确保了不会因为“多劳多得”而导致老弱病残者无法生存,事实上,这种人道关怀才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旧制度的根本方面。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平均分配虽然体现了对民生的人道关怀,但是,任何一种分配方式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能适应特定的时代,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其存在的“奖懒罚勤”的弊端便逐渐显露了出来,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需要检讨的是,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政治挂帅的思想错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发展生产误批为唯生产力论。生产力得不到发展,分配上道德价值彰显必然受到制约。而这些不足的存在也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观进一步演变与进步留存了空间,更是发展观进一步创新与升华的潜在动力。

## 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道德价值彰显

改革开放后,我党在着力解放生产力并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高度重视满足人民需求、保障人民利益等一系列与民生相关、以民生为本等问题。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以先富带动共同富裕。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仅意味着我党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人民是否富裕作为衡量制度的根本标准,自觉地做到了将唯物史观的科学标准与道德标准辩证统一。

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始终把以人为本作为党奋斗的道德价值指向,只是不同历史阶段会根据时代特点有所侧重,但总的历史演进趋势是越来越强调以人为本、反对以资本为本,高度重视人民的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最初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五大报告),再后来,修正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十六大报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十七大报告)该报告首次提出“科学发展观”,并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为报告两个独立部分,特别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一重大理论成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阶段的科学演变,充分彰显了其不断创新飞跃的科学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我国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对于人的地位与人的利益不断重视、不断强化的进步过程,充分凸显了其不断与时俱进的人民性。需要指出的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对现实问题所作的及时科学回应。该现实问题突出地表现在:其一,贫富分化日趋严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作重心逐步转到经济建设中来,为了革除平均分配的弊端、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调动人民群众劳动的积极性,在发展实践中逐步将“平均分配”调整为“按劳分配”,并提倡通过部分

人的先富所产生的积极示范效应,从而在带动后富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毫无疑问,共同富裕并非平均富裕,也不等于同步富裕,而是存在一个富裕顺序有先后、共富程度有差异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共同富裕是一种抽象可能性,那么改革开放后的共同富裕则因我国经济基础的不断夯实而成为一种现实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在部分地区、部分群体先富起来的过程中,逐步出现了唯GDP论、拜金主义等怪象,并由此导致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我国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所占有的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的相应比例为1.4%,贫富收入差距为32倍;我国1984年基尼系数为0.24,1994年为0.434,2000年为0.458,2004年为0.469,2006年为0.49,2008年为0.491。<sup>[6]</sup>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3左右,多年来变化不大,直到改革开放后,这种稳定的态势逐渐被打破,开始不断上升。严峻的贫富差距形势显然与共同富裕的目标背道而驰,客观上使得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受到了质疑与非议,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民内部关系的紧张。其二,生态危机逐步加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一系列经济成就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付出的生态代价。进一步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逐步从“依靠生态资源”转向“对生态资源索取无度”,实行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所积聚的负面效应已超过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资源锐减、污染加剧、环境恶化等发展异化现象。资源环境问题已成为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瓶颈约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现象并未随着经济领域的高歌猛进而得到有效遏制,反而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生态环境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民众对于生态环境的合理需求无从得到满足,生态危机日趋严重。“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应运而生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包括前述两类突出问题在内的现状的科学回应。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仅体现了“如何发展”的现实针对性,更体现了“为谁发展”的道德价值诉求的合理性:一是实现社会公正。公正是一个社会的首要价值,而分配公正则是社会公正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在全国性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过高、贫富差距显像化的背景下,分配公正更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为实现分配公正提供了科学的指引,不仅体现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sup>[7](p30)</sup>更体现为“对社会利益和国民收入分配的普遍调剂”。<sup>[8](p235)</sup>二是实现社会和谐。在某种程度上,和谐是一个内含道德意蕴与道德旨趣的道德范畴,追求并实现社会和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价值取向与根本道德诉求,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积极追寻并渴望早日实现的道德理想。特别是在诸如贫富差距拉大、生态恶化、区域发展不协调等不和谐因素逐步增多的背景下,促进并实现社会和谐尤为重要。而和谐不仅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更是其题中应然之义。“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sup>[9](p16)</sup>由此,不仅为科学发展观奠定了必要的道德基础,更为通过提出发展与和谐的辩证统一关系确立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道德目标与价值追求。三是彰显生态道德。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与此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表现为自然环境持续恶化、生态系统失衡、资源过度开采等现象。与其说这是发展中的科技问题,倒不如说是发展中的人与人利益冲突的道德问题,由此凸显的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的一场人与自然关系上的道德危机,而如何应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道德智慧。科学发展观提倡在遵循人与自然平等这一道德原则的前提下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发展的新型关系,不仅注重代内对自然环境的道德责任,亦重视代际对生态环境的道德义务。通过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塑,既维护了人的自身利益,又保障了生态自然利益,由此不仅彰显了人类的崇高道德境界,更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浓厚道德关怀,生态道德的韵味显露无疑。

总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在对以平均分配为核心的发展观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既承继了对于民生问题高度重视的观念,又通过大力解放并发展生产力来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从而避免民众陷入“普遍贫穷”这一看似公平的境地。并且,为了避免因过于重视物质需求的满足而成为片面的、单向度的人,科学发展观并非纯粹强调物质层面的发展,还强调包括精神、社会、生态、

文化等多层面的共同发展,并注重创新、塑造健康人格,处处烙有人的印记和人民群众的情怀,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助推。

### 三、“新发展理念”: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道德价值理念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结合发展实践进程、理论升华需要的基础上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十九大报告将其概括为“新发展理念”,而共享发展理念是其核心内容与价值旨归。在认识、把握共享发展理念过程中,不仅要体悟其中所蕴含的浓厚道德意蕴,更要深刻认识到“以人民为中心”是其道德意蕴的内核。因此,不仅要探究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道德价值的产生背景,更要去探寻其所蕴含的伦理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物质资本的高投资,以此促进经济水平的不断跃升,并逐步形成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但该模式亦逐渐显现出弊端,诸如资源消耗过快、环境持续恶化、抑制技术创新、造成产能过剩、降低消费需求等,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遭遇了发展瓶颈。因此,依靠大量资本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适时调整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便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项紧迫而必要的任务,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sup>[10]</sup>而其中的一项关键转变便是调整需求结构、坚持扩大内需。“1978~2008年,全球年均消费率为77.6%……我国的年均消费率为58.5%,与其他国家相比明显偏低。”<sup>[11](p12)</sup>正是基于我国潜力巨大、空间广阔的消费市场,通过促进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有助于形成以消费为引导,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消费为主导,应对国外复杂的经济冲击;以消费为主导,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良性发展格局,并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不容忽视的是,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形成仍存在着诸多的掣肘因素。譬如,财富分配失衡、收入差距扩大、失业问题严峻等,该类问题的存在已制约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进程。不难发现,无论是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还是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都因为存在固有的缺陷或现实的制约因素而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进而影响着民众利益的实现,甚至与民众切身的利益明显相悖,客观上急需新的发展理念引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平稳发展,并对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与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的不足予以完善。新时代以来,“新发展理念”特别是创新发展理念的应运而生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过往发展模式的缺憾,科学解决了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使经济增长获得新的动力源泉。并且,创新发展理念所指向的基本内容亦蕴藏着深厚的道德意蕴,譬如,理论创新有利于为人民提供智力支持,制度创新有利于为人民夯实规范基础,科技创新有利于为人民提供动力源泉,文化创新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此不仅体现了创新发展对于人民创造历史且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这一规律的自觉遵循,更彰显了对人民主体地位至上及其价值的高度尊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倡导实际上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并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的同时注重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将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创新发展理念虽在“新发展理念”中居于核心地位,但共享发展理念才是“新发展理念”所蕴含的价值指引与道德追求。“共享”天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它是以生产前提的公有或共有为前提的。<sup>[12](p19)</sup>共享发展理念旨在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我国将发展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经济增长迅速,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获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对发展成果分配重视不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等收入差距日益增大,基尼系数持续在警戒线以上运行。更为严重的现象是,发展成果分配不公的态势有被固化的趋势,如该趋势持续发酵,将会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也与我国社会主义本质相悖。共享发展正是在此背景下逐步演变直至被正式提出。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一方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理应由人民享有。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因此,必须秉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采取有效得力举措,力争不断缩小收入等方面的差距,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其一,关注并

帮助弱势群体脱贫。贫困问题目前仍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难题,而该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将事关共享发展能否落实。因此,我们应努力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着力帮扶中西部特别是边疆地区、偏远与落后地区,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确保都能实实在在地分享我国改革发展的成果;其二,增强公共服务共建能力与共享水平。立足于追求普惠性这一价值取向,重点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其三,强化保障制度建设。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sup>[13](p30)</sup>其四,要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要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通过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明显增加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缩小收入差距,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sup>[14](p62)</sup>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时强调:“要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sup>[15]</sup>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迈入新时代这一崭新历史背景下,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所处的重要历史阶段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价值观不仅具有浑厚的时代价值,更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并且,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促进公平正义、推进社会和谐,更在于增进人民福祉。

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价值观并非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关于对共同富裕价值的追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人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根本要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sup>[16](p35-37)</sup>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价值观旨在让人民群众共同享有改革发展成果进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让全体人民在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发展成绩,比如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带一路”倡议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及参与、污染治理与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等。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仍存在着诸如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等问题。该类问题作为我国发展过程中的“短板”,能否妥善地解决“短板”问题将直接关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扶贫问题、脱贫问题这一类突出的“短板”问题予以了极高的关注与重视,特别是对于我国偏远落后地区及困难群众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极其重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家要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sup>[17](p16)</sup>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用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成绩兑现了对人民许下的庄严承诺,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sup>[18]</sup>

在推进共享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仔细识别并坚决驳斥一些错误的论调,这些错误论调不仅无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甚至会导致人民的切身利益受到更大的损害。譬如,在践行共享价值观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如何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民为中心”之间的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民为中心”是一体两面的有机统一整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根本任务,“以人民为中心”是根本价值,“以人民为中心”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进一步完善与深化。我们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论者,既高度重视发展生产力,也高度重视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完善。如果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的主要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那么“以人民为中心”则体现的主要是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目的说到底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sup>[19](p42)</sup>通过厘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人民为中心”之间的内在关系,将有助于我们在推进共享发展过程中既可以发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奠定物质基础的作用,又可以发挥“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引作用,两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程,并为保障

人民的利益贡献着自身独特的价值。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道德价值理念既是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继承与坚持,更是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升华与创新。确立人民的中心地位,不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彰显,更是对中国共产党“为民”底色的确证。由此,将有助于真正凸显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并有助于真正维护与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从而实现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向往的愿景。

纵观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发展观的演进历程,改革开放前 30 年里,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度落后,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促使我们在发展实践中实行了以平均分配为主的分配方式,最终因“文革”导致我国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的基本物质需求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改革开放后,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大力推动经济增长便成为一项必然之举,但共同富裕并不等同于同步富裕、平均富裕,必然会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即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富。以按劳分配为基础同时伴随按资本等多种因素分配的分配方式,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拉大,伴随着少部分先富群体逐步产生的是有许多人的未富甚至是相对贫困。鉴于此,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所提出的“新发展理念”特别是共享发展理念便是对贫富差距问题的科学回应与道德关怀,并为之提供了“以人民为中心”这一科学的道德指引,从而为实现群众监督,维护与保障人民的利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sup>[20]</sup>由此不难发现,由于生产力水平、思想认识水平和文化背景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使“为民”而发展的道德尺度在不同阶段具有其不同历史特色的呈现,甚至在特殊历史时期内还会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发展为了人民这一道德的价值理念,“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不变初心与永恒追求,更是中国共产党人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大特色与鲜明底色。

#### 参考文献:

- [1] 黄明理,等. 角度·视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释讲[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
- [2]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 [3] 高颖. 从“平均主义”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谈我国分配伦理的变迁与重构[J]. 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5.
-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5] R·麦法夸尔.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M]. 谢亮生,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6] 徐充,胡灵坊. 新时代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现状,导向及对策研究[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73.
- [7]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8] 余京华.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道德维度及其当代观照[D]. 合肥:安徽大学,2010.
- [9]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10] 胡德龙,叶星. 新发展理念视角下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与测算——基于江西省样本[J]. 金融教育研究,2018,(6):38.
- [11] 刘进军,伏竹君. 试论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J]. 甘肃社会科学,2009,(6):112.
- [12] 卢卫红.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走消费主导型发展战略[J]. 中国市场,2013,(25):22.
- [13] 张兴茂,李保民. 论经济社会的五大发展新理念——研读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体会[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12):30.
- [14] 张一建. “五大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科学指南[J]. 理论学刊,2016,(2):62.
- [15] 习近平. 聚焦发力贯彻六中全会精神 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N]. 人民日报,2016-01-18,(1).
- [16] 张吕,张国镛,陈雪. 共享发展理念提出的依据及意义[J]. 邓小平研究,2017,(3):35-37.
- [17] 习近平. 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18] 习近平. 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7-10-26,(1).
- [19] 刘建武. 习近平共享发展思想的历史由来与重大意义[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3):42.
- [20] 李志军,韩苗苗.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共产党群众监督思想演变的三重维度[J]. 求实,2019,(6):4-14.

(责任编辑:余小江)